

2000.9.20

澳门文化的历史坐标和未来意义
饶芃子

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
陈光兴

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陈燕谷

镜象回廊中的民族身份
戴锦华

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
——1998年“反右”书籍热的文化分析
贺桂梅

思想

思想文综 NO. 4 THINKING

文化市场，庶民政治与先锋的终结
王昶

美国唐人街及其传统文化
仇华飞

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几点想法
陈思和

顾恺之“传神”论的语境
邵宏

寂静之途
林少阳

思想 文综 NO.4
当代文化研究专辑

思想文综编委会
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
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文综 (4) / 饶芃子主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10

ISBN 7-81029-866-6

I. 思… II. 饶… III. 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497 号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石牌 510632)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广州市新光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57 千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6.60 元

主编

饶芃子

副主编

蒋述卓

魏中林

费 勇（执行）

编辑部：广州 暨南大学中文系

邮 编：510632

E-mail: tfy@jnu. edu. cn

目 录

1/澳门文化的历史坐标和未来意义

饶芃子

10/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

陈光兴

22/文化研究与市民社会

陈燕谷

41/镜象回廊中的民族身份

戴锦华

62/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

——1998年“反右”书籍热的文化分析

贺桂梅

80/文化市场，庶民政治与先锋的终结

——（北京）达里奥·福事件个案研究

王 昶

101/作为关键词的“大众”

对二三十年代中国相关讨论的梳理

吴晓黎

165/中国通俗文化研究
——路斯研究计划，1997—2001
[美] 王 瑾 王 昶译

187/娱乐与乌托邦
[美] 理查·戴尔著 宋伟杰译

203/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访谈录

231/美国唐人街及其传统文化
仇华飞

252/关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几点想法
陈思和

274/顾恺之“传神”论的语境
邵 宏

284/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论纲
李凤亮

307/寂静之途
林少阳

319/编后记

澳门文化的历史坐标和未来意义

饶芃子

澳门自 1557 年开埠，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400 多年前，澳门被历史机遇推到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①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澳门在历史上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澳门 2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保留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名胜古迹和文献资料。在澳门，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妈阁庙、普济禅院，也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大三巴牌坊、天主教堂；在大街小巷中，还有中西不同风格的建筑群。这些，都表现了澳门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汇多元、共生的特性。中国和欧洲各国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文献资料也极其丰富，除明清典籍中留下的大量关于澳门历史文化记载，在澳门本地及葡、英、法、美、荷等国均藏有澳门历史文化的西文档案。面对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史学家断言：“澳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其历史文化价值足以与敦煌文书及其洞窟壁画相媲美。如果东西方学者能够像研究敦煌那样来研究澳门历史文化，同样可以使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一门国际显学。”^②当然，现在我们关注澳门文化，并非仅指澳门的文化遗物和历史资料，它应该包括中西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和开放精神，因

为这当中有未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澳门是具有世界文化影响和意义的地区，从澳门看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碰撞和交融，研究她跨文化性质的内涵，包括源流、区域、性状、生成原因和嬗变，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封”的学术话题。下面，仅就与此有关的两个问题进行论说。

之一：小地区大文化

今天的澳门是一个只有 40 万人口 20 平方公里土地的半岛，地域很小。但一个地区的文化学术意义和价值并不决定于该地区面积的大小，而是在于她的内涵，她所蕴含的文化学术命题的价值和意义。澳门地区虽小，但历史独特，她的历史文化更是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不能取代的。从历史上看，澳门原属广东省香山县，文化上与粤港两地一脉相承，都是有岭南特色的粤文化。在葡萄牙人 1553~1557 年据居澳门之前，这个小岛就有居民，早在木帆船时代澳门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并且在 16 世纪初期就名传海外。^②葡萄牙人入据后，澳门便逐渐发展成中国领土内一个独特的商贸海港。在殖民扩张热潮中，约有三个多世纪的时间，澳门地区处于中葡共处分治，既有冲突，也有沟通，有过激烈的碰撞，也有相互迁就和包容，1888 年，正式获得“永驻管理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在澳门地区推行殖民政策，但由于岛上居民，绝大多数是华人，澳门文化一直是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依然保持华族的风俗习惯，一些土生葡人在澳门的地理人文环境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地追随华人文化，学习汉语，看中医、吃中药，甚至入庙拜神。葡国当局逐渐意识到保持华人文化传统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于 1909 年制订并通过《澳门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将华人的风俗习惯制度化，这就形成了澳门地区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

澳门文化的中西合璧，体现在语言、宗教、民俗、建筑、饮食等多个方面。澳门是汉、葡、英三语通用的社会。民间用语主要是汉语（主体是粤方言），葡语是澳门当局的官方用语，英语则主要是用以与外间世界沟通的工具。此外，还有一种“澳门土语”，这是澳门地区特有的，是一种由16、17世纪的葡语和粤方言混合的语言，也杂有少量的非洲语、马来语、西班牙语等，以拉丁字母成文，是早期土生葡人使用的“土语”，现在已不再使用，但从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资料看，“澳门土语”的形成和演变，是受到澳门地区多种语言的影响，与这一地区多元文化的背景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中葡文化在澳门相遇交融的产物。^①笔者曾多次访问澳门，参观过澳门的庙宇、教堂和各种宗教遗址，对澳门宗教的多元并存有极深的印象。在澳门，东方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鲜为人知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门教，都先后落脚，而且和平共处，各不相扰，表现出这一地区文化的宽容性和包容力。文化的多元并存，是20世纪的思想，而且是在本世纪后半叶的文化转型期才被广泛认同，但在澳门却是很早就存在的现实。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中国文化的宏观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宗教融合、中西文化互补方面，澳门文化无疑是先行了一步。”^②

中、欧文化出自两个不同的源体，思维观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但400多年前，中、欧文化在澳门相遇，从碰撞到交融，使这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活力和魅力。如果我们不是把文化只置于精神思想的范围，而看作是这个地区人们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们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就不难发现，在澳门的文化生活中，有不少是中葡乃至于中西文化互相交融的。以澳门的象征大三巴牌坊为例，这面名扬中外的牌坊，就有东西方艺术交融的特点。大三巴牌坊是原圣保禄教堂的前壁，圣保禄教堂历史

悠久，在我国古籍中称为“三巴寺”，《香山县志》和《澳门纪略》均有记载。该教堂于1835年1月失火焚毁，只有教堂正面由巨石垒成的玄关保存下来，成为和中国式牌坊相似的遗迹，所以人们习惯把它称作“大三巴牌坊”。澳门学者徐新曾对大三巴牌坊的建筑设计 and 雕刻进行过详细考察，指出：牌坊主结构是由40根石柱组成，“是典型的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但牌坊的装饰雕刻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是东西方历史、艺术和谐的融汇。牌坊共五层，第一层三个门，正门镌刻着葡文“天主圣母”，左右两门对称刻着神圣的耶稣基督字样，而在牌坊的第三层则刻有中文“念死者无为罪”、“圣母踏龙头”、“鬼怪诱人为恶”的箴言和警句，牌坊第三、四层左右两端都有近似中国传统的石狮子雕塑，牌坊第四层壁龛安置着耶稣铜像，铜像的两旁镂刻有西方的野百合花和东方的菊花浮雕图案，这一浮雕图案和日本同一时期的装饰图案相似，而石狮子的雕塑显然是受到中国民间舞狮子艺术的启发，与中国庙宇门前左右对称安置的石狮子在意念上也是相通的。徐新根据牌坊的建筑和雕塑，并查证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有关资料，证明：“在那个时代的巴洛克建筑上，刻有中文字样的只有澳门的圣保禄教堂。”^⑤他还将圣保禄教堂同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里斯本圣心大教堂相比较，认为其他的三个大教堂均未具有大三巴牌坊上装饰雕刻的东方色彩。由此可见，大三巴牌坊虽然是大火之后留下来的一面残壁，但当中却保留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足音和历史记忆，在历史层面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空间，启发人们去作新的文化想象，它的存在和意义，是世界性的。

澳门400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的历史，使她成为中国和葡国以及各拉丁语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地区丰富的语言现象，多元化的宗教，中西融合的建筑，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个

城市跨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但有一种文化现象是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那就是生活在澳门的“土生”族群和他们的文化。居住在澳门的葡人，有相当数量是“土生”葡人，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中葡血统的混血儿。他们在澳门出生、长大，生活在华人占绝大多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澳门，能讲流利的葡语和粤语，他们身上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既有葡国文化思维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常常使他们陷入尴尬的处境。正如“土生”葡人诗人欧利安在《澳门之子》一诗所描述的：“头发永远深不变色/中国人的眼睛，亚利安人的鼻梁，/东方人的脊背，葡国人的胸膛”，“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出自本性娶的是中国人”。这些“土生”葡人一方面确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澳门之子”，是“百分之百的澳门人”；另一方面来自父亲的遗传是葡国文化天然的继承者，自幼在学校接受的也是葡国式的教育。他们生活在双重文化背景下，处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两种文化的渗透、交融、矛盾冲突在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上有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理，一种中西合璧别具一格的文化思维模式，这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思维模式，也是400年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土生”女作家玛尔丁妮在《废墟中的风》一书的序言中有过一段关于“土生”葡人的描述：“四个世纪以来，葡国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这一城市的许多方面：交汇融合的文化遗产，别具特色的城市建筑，还有它的被称为土生人的混血人种。经过这许多年肩并肩的生活，中国人气质一点一滴地渗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们那带着显著的澳门人特点的欧洲人外貌上，为他们线条硬朗的欧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东方之美。”^①“土生”诗人欧利安在他的诗中也写到：“我身上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确实，我发起怒来就是

一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平和。”^[7]这是“土生”作家对自己特殊文化身份的形象剖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土生”葡人身上两种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人格特征。就澳门的“土生”族群而言,文化身份复杂而多彩,具有边缘性、交融性,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基本上是照葡国(文化)模式和形态组织自己的。这是澳门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应纳入澳门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是与世界相通的。

之二:和而不同与多元共生

在澳门半岛上,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几乎随处可见。但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尽管葡萄牙人据澳门已400多年,但直至现在,澳门居民的中国传统氛围还很浓厚,在精神思想范围内仍是“葡河汉界”,使澳门文化既呈现出多元交融又具有和而不同的特性。

澳门很早就是葡萄牙基督教在东方的基地,而且外国宗教是经澳门向中国内地发展传播的,至今澳门仍有30多个教会学校,占澳门学校的1/2,但基督教在澳门华人中的影响却很有限,现在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主要信奉的还是中国的神佛,本土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有人说,当今的澳门,比中国内地还要“中国化”。澳门的妈祖阁和妈祖崇拜,就体现了“中华文化在澳门的强大背景,具有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妈祖是民间崇拜的航海保护神,是中国沿海一带(主要是福建、台湾、广东)民俗文化的一种,后来远传海外,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及全世界。澳门的妈祖崇拜与中国内地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相传澳门的妈祖阁最早是福建商人兴建的,从福建的祖庙分香过来,以方便他们的商人往来贸易时祭祀。据澳门学者郑炜明提供的资料,最早的妈祖庙应建成于公元1488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8]由

于澳门自16世纪初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古代人出海远航，风涛险恶，为了祈求神祐，澳门居民很早就形成了虔诚的妈祖崇拜，一直延续至今。除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辰外，每年春节妈祖阁的香火也很盛。如前所说，澳门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多元性、包容性，但比较而言，在并存的多种文化中，中华文化显然占据最大比重。在澳门，妈祖文化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同属于中华文化的系统，正如郑炜明所说：“整个澳门地区，其实是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④从澳门这一文化视点看，这个半岛虽已经历了400多年西方文化的撞击，在深层的精神文化领域里，华人与葡人之间显示出来的文化状态却是和而不同。这同回归前的香港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地区很不一样，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世界上多元文化崛起的今天，对澳门这个地区的多元文化景观、特别是华人和葡人如何达到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应成为国际学术界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四个多世纪来，澳门作为东西文化的接合点，澳门社会“华洋混杂，和平共处”，既保留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又包容西方文化，各种各样异质文化在这里共生、共存、积淀、交融、整合、创新，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多元性。在当代，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随着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和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必将带来世界多元文化的繁荣，因而，国际文化环境越来越显得重要，人们都希望，不同民族相遇合，即使政见相异，也求文化相融。但要做到这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多元文化的环球认同，而要认同“别人”，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自己文化传统和他种文化的问题。在这方面，澳门文化的多元共生、交汇融合、和而不同的现象，对未来应有所启迪。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澳门文化的跨文化现象——差异性、共

同性、多维性，就不难发现，在澳门这块弹丸之地，由于她昔日的历史和长期所处的边缘地位，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文化中心论早就隐退了，中葡文化、雅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均能和平共处，做到和而不同，它们之间，从未构成激烈的冲突。随着历史的脚步，澳门文化也有她自身的轨迹，却未见有惊涛骇浪和运动的兴衰。澳门的社会发展过程表明，无论是华人，还是葡人，并没有在他们和谐相处的真实生活中表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文化观。相反，在某些方面彼此的界限还很模糊、混杂，如圣保禄教堂是西方的天主教堂，历史上华人却称之为“三巴寺”，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教堂的正面玄关，现在澳门居民却把它称作“牌坊”，西望洋主教堂的圣母塑像，面向大海，澳门人习惯上称之为“面海观音”，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教堂与寺庙、圣母与观音，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初到澳门的人，对这些会感到奇怪，但长期住在这里的居民却习惯成自然，都能接受、认同这一切。在澳门街道上，各种异质事物并存，不同的肤色、语种、文化习俗共生互渗，给这个地区的文化生活带来各种不同的色彩，呈现一种带有后现代性质的文化景观。

澳门是一个“跨文化场”，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前，从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模式，都应给予更多的审视，共同挖掘澳门的传统优势，继续发挥澳门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接合点、辐射圈的功能，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互动力。

记得四年之前，在澳门文化司署举办的一次文化研讨会上，季羨林先生曾以《澳门文化的三棱镜》为题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澳门文化是人类迄今四百多年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逆向

交流和多元融合的独特产物，澳门的精彩之处和它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也就在于那经由长时期东西文化交融所产生的客观存在的人文价值方面。”^⑩他认为：“澳门文化不只是人类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它必然要在东方的新世纪里继续闪烁独特的光芒。”^⑪季先生的这些话，应有助于我们对澳门文化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对研究澳门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1998.5.18 于暨南园

饶芃子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

- ①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2年2月出版，第274~275页。
- ②参见戴裔垌《〈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 ③参见彭慕治《澳门文化的并流和合作》，澳门《文化杂志》1987年第5期。
- ④王岳川在《后现代与中国文化建设》第六部分“后现代与澳门”的发言，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春夏季卷
- ⑤参见徐新《澳门的视野》，澳门基金会1994年4月出版，第1~6页。
- ⑥EDICH JOSGE DS MASTINI《THE WIND AMON THE RUINSACHILSHOOD IN MACAU》.
- ⑦LEONEL ALVES《SABEA QUEM SOU ?》，《POR CAMINHIS SILITARIOS》P29.
- ⑧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出版，第6页
- ⑨同上，第7页。
- ⑩季羨林《澳门文化的三棱镜》，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5月6日在澳门文化广场展览厅举行《文化杂志》第二系列发行仪式上的讲话。
- ⑪同上。

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

陈光兴

新左派与文化研究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快速地渗入各个领域，所召唤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绑锁在单一既定的学科之中，或是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但是如果用较为狭窄的历史界定，英国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知识传统。它在学院内的建制化，可以说是肇始于1964年在柏明罕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课程与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集结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

任何社会文化理论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经验相互关联，英国文化研究的浮现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面临全面性的调整，从生产关系、政治民主文化形构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现代化”所指称的即是社会结构转变的表象，

由工业资本转形成“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post-industrial-late capitalism）而被史学家用来描绘这种转化。

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科技的资本化及理性化，填满了整块文化生活空间。大量的人口首次被吸进这块空间。“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危机确实威胁到原有的“本土文化”；这种威胁所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阶级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及文化形构民主化的可能性。

关切文化议题/走向逐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焦点，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现的历史条件之一。

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出现与英国新左派（New Left）的崛起密不可分。准确地说，“新左派”之名诞生于1956年的历史环节；11月苏联坦克开入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不久，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区。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很明显地揭露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体制——西方帝国主义与史达林（斯大林）主义——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性及侵略性。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社会主义分子已经不可能盲目地相信史达林主义的教条，甚至必须根本地质疑苏联革命以降的历史大悲剧。另一方面，苏伊士事件也使左翼分子觉醒到殖民主义并未终结，福利国家的出现更不代表剥削的消失。也就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新左派企图去找寻第三种政治空间，重新界定新的社会主义立场。

新左翼的形成结合了两个不同的传统，或者是两代不同政治经验的群体。第一个传统，以汤普森（E. P. Thompson）、萨韦利（John Saville）、霍布斯班（E. Hobsbawn）为代表，他们在30年代曾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人民战线的运动，主要成员多为历史学者，在英国共党中组成历史小组，匈牙利事件后在党内因批判史